

酒经·酒艺·酒药方

王纘叔

王冰莹 编著

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唐·杜甫



西北大学出版社

酒经·酒艺·酒药方

JIUJING JIUYI JIUYAOFANG

王纘叔 王冰莹 编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西安

酒经·酒艺·酒药方

王绩叔 王冰莹 编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校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302590)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史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3 印张 326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604-1285-8/G·170 定价: 18.80 元

序

据一位前辈学者考察，弄文的人首先是要自己写书，等书写多了、名气大了才有资格给别人的书写序——当然，也有可能尽管有了名，但却已江郎才尽，写不出书来了，遂只好利用已有的名为别人的书写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再往后，连写序也感到力不从心了，便等而下之地给别人的书题签。或有人以为此论太嫌刻薄，但环顾时下坊间绝不少见的那些文不对题的序，言不及义的序，浮皮蹭痒的序，便可知确有一些有资格写序的人不认真写序，还有一些没能力写序的人硬要写序，以致我忍不住要妄改亚圣孟子之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为“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了。

行文至此，忽然觉得前述一段文字似乎是在自掘陷阱。因为此次展纸握笔，为的是给王纘叔教授和女儿王冰莹编著的《酒经·酒艺·酒药方》作序啊！照前文所言，在下岂不是正在充当“人之患”吗？当然，为王教授的大作写序，在资格和能力上我无疑都不是十分具备的。之所以勉为其难应允此事，一是纘叔先生一向被我敬仰，他金口已开，我难却盛情；二是恰恰在对酒说三道四这件事上，我还稍稍有一点儿自信心。从年轻时起，我就颇有几分杜康之好，先是饮白酒，后来喝啤酒，现在则主要品尝葡萄酒，间或也享用黄酒。不过我的饮酒虽几十年如一日，却一直有节有度，与酗酒、发酒疯那样的档次是严格拉开了距离的。故而我来说酒，既不会把酒捧得天花乱坠，也不会把酒贬得一文不值，立论公正的把握绝对是有的。也正是缘于以上两端，我才肯冒着当一次“人之患”的危险，以《酒经·酒艺·酒药方》一书为由头写下这千余言对酒发感慨的文字。

毋庸置疑，酒的出现以及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历久不衰的广泛存在，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酒最早的研制者在我看来是不可考的，尽管中国有仪狄造酒或杜康造酒诸说，古希腊神话、古印度典籍、以及希伯莱人的《圣经》中也多有酒的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几乎从人类的洪荒时代起，酒就在地球上出现。许多年来，与酒有关的喜剧和悲剧、正剧和闹剧在中国和外国的大地上几乎是不间断地上演，酒的功耶过耶，也实在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话题。

在某些宗教徒眼里，酒是不折不扣的万恶之源。如佛典《四分律》即认为：“饮酒有十过失，一颜色恶，二少力，三眼不明，四见嗔相，五坏田资生，六增疾病，七益斗讼，八恶名流布，九智慧减少，十身敝命终，堕诸恶道。”似乎不好说此论毫无道理。但另一方面，无须引经据典，只是随意想想，也能够总结出酒可以用来进行感情投资并产生出不可忽视的效应，酒常常诱发作家艺术家的灵感，催生千古不朽的佳作鸿制，酒作为保健养生用品在民间广泛应用等等酒的积极作用。亦为天使，亦为魔鬼，酒的确如一枚金币一般，有着它截然不同的两个侧面。但应该看到的是酒毕竟是一介“死物”，而“活用”它的则是人。所以我们必须承认，酒的或成天使，或成魔鬼，起关键作用的其实是喝酒的人。

倒行逆施的大革文化命时期，有“知识越多越反动”和“书愈读愈蠢”之谓风行一时。无须从治国平天下的大课题上论证，只要看看现实生活中的酒人酒事，即可知此论之大谬矣。我饮酒数十年，说句不算十分夸张的话，那就是什么样的酒场都经过，什么样的饮者都见过。见多识广以后我有如下感受：就一般规律而言，一个人文化修养的高低总是和他在饮酒时表现出来的文明程度成正比的。不能否认，与酒有关、甚或因酒而生的种种不文明乃至丑恶现象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均比比皆是；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也就是我在前面已经陈述过的那个观点，产生这种现象过不

在酒本身，而在于饮酒人。从酒的历史以及现实生活中酒种类品牌的繁多和使用的极为广泛上，中国在世界上都无愧于酒大国的称号。但有酒没文化（或曰多酒少文化），又是我们这个酒大国的不幸事实，酒丑恶的一面也因之得以猖獗，这未免让人扼腕。所以，倘若真想对酒“隐恶扬善”的话，那大力弘扬健康的酒文化，不断提高广大饮酒者的文化修养，就是唯一的治本之途。

而王纘叔教授所编著的《酒经·酒艺·酒药方》又恰恰是弘扬酒文化的扛鼎之作。其中的“酒经·酒艺”是务虚，可以使人受到陶冶，“酒药方”则是务实，能够让人便于操作。这种虚实兼备、雅俗共赏的编著为好饮者所喜闻乐见，在我看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记得《汉书·食货志》曾曰酒乃“天之美禄”，翻译成语体，即为酒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美好享受”是也。只不过面对着“天之美禄”却不能以正确的观念和方法去享用，相反倒引发出诸多害己害人害社会的弊端来，这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因此，我才向广大饮酒爱好者大力推荐《酒经·酒艺·酒药方》以及其他所有与酒文化有关的书。其目的，小而言之是为了我们自己能真正消受酒这个“天之美禄”，大而言之则是为了使包含在社会风气之内的酒风得以不断端正。

是为序。

商子雍

1997年12月22日冬至节

引 言

酒是人类饮食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酒一问世，就以其极广博、极活跃的亲和力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几千年来，从宫廷到民间，从中土到边野，从君王贵戚到平头百姓、士卒贩夫，乃至山林隐者、江湖人物、走方郎中等全社会各类、各色、各地、各层的芸芸众生，无不徜徉在酒的海洋之中，其中一些“酒仙”、“酒徒”，更是对酒“如醉如痴如狂”，一年三百六十日，“但愿长醉不复醒”。几乎在人类所有的社会活动中，国家的祭天、祀祖、朝会、宴宾，固然是“无酒不成礼”，就是在民间：客从远方来，无酒不足见款款深情；友到异乡去，无酒不足表达依依情意；良辰佳节，无酒不足成其乐；丧葬忌礼，无酒不足致其哀；仕途蹉跎，无酒不足消其忧；春风得意，无酒不足畅其怀。以至日常的四时八节、访亲探友、交际应酬、贻聘礼尚，无一不有酒的踪影。酒成了全人类一日不可缺、一时不可无的胜饮灵物。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酿酒的古国之一。我们的祖辈，在创造自己悠久古老文化的进程中，不但以中华民族独特超人的智慧，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酿酒经验，酿制出无可数计的色香味各具特色的种种名酒；而且还以美的追求，赋予了饮酒这一物质消费以多彩的精神情趣。在饮酒的过程中，融进礼仪、道德、风化、伦理、文学、音乐、歌舞、绘画、书法、武术，形成了我国独有的灿烂丰富、色彩缤纷的酒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古文化遗产中极可珍贵的宝藏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饮食文化特殊的奉献。

在我国，酒的酿造和饮用有着十分古老的历史。关于人工酿酒
的创始人，古文献里有许多不同的记载。

秦汉时辑录的古帝王谱系《世本》记：“仪狄始作酒醪，变五
味。”西汉刘向编著的《战国策》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
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我国第一部字典、
成书于东汉的《说文解字》释“酒”字也说：“古者仪狄作酒醪，
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据这些古文献记载，酒的发明人为仪狄，
是我国第一个王朝的创建者大禹的臣民，其时距今约4000年。

另有一说是“杜康造酒”。《世本》在“仪狄始作酒醪”后又
说：“少康作攄酒”。《说文解字》在对“帚”字的释义时也说：
“古者，少康初作箕帚、攄酒。少康，杜康也。”但杜康是何时人，
在历史上却从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他是黄帝时人，有说
他是夏朝的第五代君王，也有说他是周代、汉代的，但都无确凿
证据。因之宋人高承在《事物记源》中感慨说：“不知杜康何世人，
而古今多言其始造酒也。”其实“古今多言”杜康造酒，主要得力
于曹操的名诗《短歌行》，其中有句：“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
以解忧？唯有杜康。”随着曹诗广为传诵，世人遂把杜康奉为始
造酒的祖师。

不过，古书的这些记载都不足为凭，古代即有人对其持怀疑
态度。宋人宴荇在其《酒谱》一书中就对上述几种说法有一段颇
为精湛的议论：

世言酒之所自始，其说有三。其一曰仪狄始作酒，与禹
同时。又曰尧酒千钟，则酒作于尧，非禹之世也。其二曰：
《神农本草》著酒之性味，《黄帝内经》亦言酒之治病，则非
始于仪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天地并矣。
予以为是三者皆不足以考据而多赘说也……又曰：“非仪狄

也，乃杜康也”，武帝乐府亦曰：“何以消忧？唯有杜康。”或者，康以善酿酒而得名于世乎？谓酒始于康，果非也。

不是仪狄，也不是杜康，那么始作酒者究竟是谁？又在哪个时代？对此，窦苹有一貌似模糊、实则十分科学的推断：“然则酒果始谁乎？予谓智者作之，天下后世循之，而莫能废。”

智者，自当是有智慧的聪明人，但不是某一个，而是世代相继的一群体。远古的原始人群无意中发现了天然酒，其中善思索、勤观察的人从“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芬”（江统《酒诰》）中，悟出了谷物郁积霉变可成芬芳醉人的酒，便有意仿照天然酒的生成，利用谷物中自有的曲蘖来郁积酿酒。甲骨文中的酒字作“𪚩”，形象地表示出谷物浸入水在容器中发酵成酒的过程。这个时期至迟当在夏禹立国前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据考古发掘，在公元前45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有大量的陶器，其中灰陶尊、白陶豆、黑陶杯都是用来盛酒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000年，其时人们的生活中已出现了“酒器”，不仅是酒进入人类生活的最有力的历史物征，而且也是人类酿酒已达一定规模的标志。那么，我国酿酒的始源自然远在这一历史时期之前了。

再考之古代文献，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记载：

泰，有虞氏之尊也；嚌，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牺、象，周尊也。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

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斚，周以黄目。其勺，夏后氏以龙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有虞氏为古史传说中的远古部落，舜是其首领。夏后氏也是远古部落，禹为其首领。禹之子启建立了夏，传十三代、六王为殷所代。殷传十七代、三十一王为周所灭。据《礼记》上述记载，

则在舜、禹、殷、周，酒器已各有其专一名称了。

到了商朝，用曲酿酒的技术已普遍应用。《尚书·说命》记载，公元前 21 世纪，商王武丁对他的臣民说：“若作酒醴，尔维作曲。”说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用曲酿酒的方法。曲，是促进谷物糖化和酒化过程连续交替进行的核心因素，利用曲来复式发酵以制酒，自然大大提高了酒的质量。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酿酒技术的不断提高，到了周代，著名的酿酒“古六遗法”便应时产生。这就是《礼记·月令》所总结出的：“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法，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从选料、制曲、操作、水质、器具、温度等六个方面指出酿造美酒的诀要。这是周代以前的古酿酒经验的重要总结，标志着我国酿酒技术的成熟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形成。从此，大规模的酿酒作坊迅速发展，酿造出名色繁多的美酒佳酿。据史书可查的先后计有：大禹时的旨酒，少康时的秫酒，殷商时的黍酒、稷酒、酎、醪、醇、醕，西周时的春酒、醕、浆、黄流、矩鬯、酎、醕、醕，以及“五齐”（泛齐、醴齐、盎齐、缃齐、沈齐），“三酒”（事酒、昔酒、清酒）等。到了春秋战国，又有玄酒、奶酒、桑醯、澄酒、桂酒、鬯酒等等。

由于酒的批量生产，在夏、商两朝都出现了国君耽于酒乐而亡国的故事。《新序·刺客》记：夏桀造“糟堤酒池”，“酒池可以运船，糟堤可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论衡·语增》记：商纣除造“糟堤酒池”外，还“好长夜之饮”，有次竟连饮七日七夜，并且“悬肉以为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间，是谓醉乐”。这里，我们姑且不论桀纣这两名亡国之君的荒唐淫奢，仅就其“酒池可以运船”、“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的场面，就可想象出其时官酒的生产规模如何之大了。

酒，作为一种质地特异的饮料，从一入世便融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酒礼和酒几乎同步诞生。周人刚刚取商而代，为维护巩固已得政权，周公便以大气力“制礼作乐”。于是，周初的政治文化，就以“礼”为渊海，集前古之大成，开后来之政教。至今可读到的、相传为“周公旧制”的《周礼》、《仪礼》、《礼记》等典册中，诸如：“酒正”、“酒人”、“浆人”、“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燕礼”、“聘礼”、“觐礼”、“士丧礼”、“乡饮酒礼”、“曲礼”、“月令”、“礼器”、“祭法”等众多篇章中都对酒在各种社会活动时的地位、陈设、酬酢、置撤有严格、隆重、繁缛的规定。我们只要读读本书所选的《乡饮酒礼》便可见一斑。

为什么周人对酒礼如此敬严礼重呢？因为在我国，古代圣贤们都把提高人们道德心态作为“正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社会长治久安的基本措施，所以大力推行礼乐教化。荀子说：“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措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荀子·强国》）于是一日不可无的饮食活动，便成为引导人们学礼、习礼、施礼进而达到正身心、淳教化的不二法则。这一将酒“礼化”的目的在《礼记·乡饮酒义》中有明确的说明：

乡饮酒之义，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盥洗扬觶，所以致洁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让洁净也者，君子之所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洁净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辩矣。

祭荐祭酒敬礼也，哂肺尝礼也，啐酒成礼也。于席末言：是席之正，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

可见，周人是在从物质享用的饮酒活动中，着力开创饮酒的精神意义，以寻求超出物质享受的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和教化目的，使饮酒包孕着重礼、尊君、敬长、正心、修身等多重深层次含义。

在西周，被礼化了的酒，曾广泛用于天子诸侯的祭祀、会盟、觐见、朝会、成礼和征伐这些重大活动中。《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政治宗教化的周统治者，宗庙社稷是合二为一的。宗庙祀先祖，社稷祭天地，这是周人的头等大事。然而无论祭天或祀祖，所用祭礼中，最神圣、最重要、最突出的首当是酒。

《礼记·礼运》篇说，祭祀时，首先设酒：“玄酒在室，醴醕在户，粢醢在堂，澄酒在下。”再“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诗·周颂·丰年》也讲：“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小雅·信南山》里记：“祭以清酒，从以騂牡，享于祖考。”都表明了周代祭祀用酒之敬重。而且玄酒、醴酒、粢醢、澄酒、清酒各种名目的酒都要按礼设置在固定方位，不能有一丝错乱。因之，周人设立了掌管酒事的专职官吏——酒正、酒人、司尊彝等：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醕齐，五曰沉齐。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饮之物，一曰清，二曰医，三曰浆，四曰醕。

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大祭三贰，中祭再贰，小祭壹贰，皆有酌数。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诏其酌，辨其用与其实……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大尊，其再献用两山尊，皆有罍。诸臣之所作也。凡

六彝六尊之酌，郁齐献酌，醴齐缩酌，盎齐沆酌，凡酒修酌。

大丧，存莫彝，大旅亦如之。

除开“祀与戎”，周朝的王公贵族在日常宴乐中，也时时离不开酒。《诗·大雅·行苇》写到：“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或献或酢，洗爵莫斝。醢醢以荐，或燔或炙。嘉肴脾膾，或歌或嘏。”宴会场面盛大，美酒肆设、嘉肴陈列，主客之间你敬酒我还酢，并且载歌载舞，气氛热烈。其时，不但王公贵族的大型饮宴，就是士大夫之间的送往迎来，好友相聚，也处处有酒的飘香。《诗·小雅·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小雅·鱼丽》：“君子有酒，嘉宾或燕以乐。”《小雅·吉日》：“以御宾客，且以酌醴”等等都是其生动而真实的记录。

要而言之，在西周，酒是礼化了的，是统治者和高层人士祭天祀祖、会盟饮宴不可或缺的圣物。但由于森严的等级制度，饮酒尚为贵族统治集团所垄断，一般平民除在节日为奴隶主祝福时，“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豳风·七月》）外，是不得也无以饮酒的。

三

社会在进步，生活在提高，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向。到东周战国之际，奴隶制解体，“礼崩乐坏”，再加上酿酒业的发展，酒遂逐步解脱了贵族统治阶层的专擅。孟子的“齐人有一妻一妾者”说，齐国有一人每日到墓地乞食祭余之酒肉，而“骄其妻妾”；韩非在“狗猛酒酸”里说：“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吕氏春秋》记有齐之勇人相遇于涂，二人饮酒“割肉相啖”；《战国策》在《齐策·画蛇添足》中写道：“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等等，虽都是寓言，但也投影式地反映了酒已走下祭台神坛，进入寻常百姓家。而街头巷尾也已出现酒帘高悬的沽酒店铺。这样，酒便日益深广地流入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也渗透人类精神意识的各个层面，不仅与政治、与军事、与经济，也与哲学、与文艺、与养生、与怡情交织融溶，产生了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五彩缤纷的酒文化。

择其要者，首先跃入人们眼底的是魏晋名士通过饮酒对人的生命意义、人生价值标准的深层探索。

天地之间，林林总总，万类竞生。虎啸深山，鱼游浅底，各得其命，各适其性。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位置在哪里？人的存活意义和生命价值是什么？这在儒家礼教中答案是不容置疑的：“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即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人生价值标准就是遵“礼”、行“礼”，按“礼”的规定祀神、事君、尊长、亲亲，除此而外，人自身是没有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这是群体功利观对个体人格的轻蔑，是扭曲和抹杀人的本性的，所以自古以来为达者所不取。和儒家同时并出的老庄学派就对人生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我”有独立的人格、天生的真性，不能因后天人为的礼所剥夺。他设喻说：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龔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烙之，连之以羈帛，编之以卓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楫饰之患，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庄子·马蹄》）

他以此形象地显示出人为的礼教摧残人的天性。因而要实现人生的真正意义首要是毁弃种种羁绊，恢复人的真性。但在现实社会里这只能是一种美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智者庄子却从饮酒中得到启发，由于酒精的刺激，饮酒的人可以形骸礼法一切皆忘，精神自由邀翔，行为踰规狂放，显示出人的真性。

因之他提出了“醉者神全”这一哲学命题：“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也不知也，坠也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摄。彼得全于酒。”（《庄子·达生》）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大解脱的时代。礼教的衰微，老庄的流行，玄学之大炽，佛教之侵入，动摇了思想意识上儒家的一统天下。加以现实黑暗、政治险恶、战乱频仍、祸福无常，于是聪明有智之士对以往笼罩在人们头上的神圣光环产生了怀疑：原来一切礼教规范、功名利禄、价值标准全是虚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充满生离死别、忧愁哀伤才是真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爱惜自己、珍重生命呢？为什么不冲破礼教束缚、寻求生命真性、尽情享受人生呢？何况，人的生命有如朝露般短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于是孔融、孟嘉、陶渊明等一大批魏晋名士便浸溺到美酒之中。他们以酒蔑视礼法，借酒全生避祸，因酒适性自恣，更凭酒“醉来赢取自由身”。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以为常”。他纵情适意，“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终日不归”，听说“步兵厨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当时的君王“文帝初欲为武帝（时为太子）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均见《晋书·阮籍传》）。嵇康“轻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任性饮酒，非礼毁法。山涛举荐他做官，他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表明自己：“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毕矣。”（见《晋书·嵇康传》）刘伶“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锺而随之，曰死便埋我”（《晋书·刘伶传》）。而在其后的孟嘉、陶渊明更以诗酒名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不做，“宁固穷以济志，不委曲而累己”，“啸傲

东轩下，斗酒聚比邻”，“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深谙饮酒全生适情之味。

表象上的纵酒、放达、任性、消极，其实质都在表现了一种以个人生命为中心的人生观，核心是对生命的执着，是对人生、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与留恋。它标志着人的觉醒，和对自己生命意义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与追求。这在人类成长史上自然有新的进步意义。所以，阮籍他们既无显赫功业，又无可称道的道德品性，却以其个体人格本身，以其对自由人性的追求，成为世人的理想和榜样。

由庄子提出的“醉者神全”，在魏晋名士这里得到了实践的“验证”。这是一个充满人性的哲学理念，也是一个借助酒的属性才完成的哲学命题。这不能不是我国古代浩瀚的酒文化里夺目的一页。

四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章。国势强大，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边疆巩固，整个社会生气勃勃，欣欣向荣，激荡着一派蓬勃向上、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在文坛艺苑也形成了一种气势豪壮、高亢奋进的“盛唐之音”。无论诗、文、书、画、歌、舞都名家辈出、佳作如林，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在这“盛唐之音”的形成中，酒起到了美妙奇异、超群轶伦、无以替代的巨大作用。

古人说得好：“酒酣肝胆尚开张。”酒能激发人的高昂热情，酒能唤起人的英雄气概，酒能孕生人的奇妙幻想，酒能引出人的万古情思，酒能使人忘乎所以，而这一切对于文学家、艺术家的天才创作真是有如神助。正如一位诗人所言：“酒酣意放，搜罗万象，驱入毫端，窥造化而见长性。虽片纸点墨，自然可喜。”无怪乎曹植“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无怪乎李白说自己“心中醉时胜醒时”，更无怪乎清人唐宴总结出：“酒为酣墨胆，力可夺三军。”

翻开唐代艺术长河的每一页剪影，我们都会感受到酒的飘香。

唐代是诗人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其中最伟大的莫过李白与杜甫。他们分别被世人推崇为“诗仙”、“诗圣”，但同时，他们又是实实在在的“酒仙”、“酒圣”。

李白好酒是闻名于世的。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他：“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开元天宝遗事》说他：“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醉中所撰文章，未曾错误。”《本事诗·高逸》里生动地记录了李白醉酒作诗的趣事：一次唐玄宗诏李白作诗，李白已在宁王那里喝得醺醺大醉，被内侍扶到皇帝面前还站立不稳，但当笔墨陈列到面前，李白却“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风腾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

比之李白，杜甫一生贫穷，遭际战乱，但他从少至老，始终不忘酒杯。年轻时，“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老来困居江湖，仍是“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和李白一样，杜甫也是诗酒并品的。他时时邀朋友一起共饮美酒，切磋文章：“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杯酒，重与细论文。”他自己作诗也常常借助于酒：“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

饮酒，铸就了李白、杜甫的诗魂。

唐人草书，首推张旭、怀素。“颠张狂素”，前后辉映，神传千代。张旭嗜酒到了颠狂地步。《国史补》记：张旭“饮酒辄草书，挥笔大叫，以头搥水墨中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怀素是个和尚，但好酒若命，一日九醉，人称“醉僧”。每醉之后，他便乘兴挥笔狂书，自云：“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自叙帖》）“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宣和书谱》）。